

1992年,大批就职于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受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影响,纷纷主动下海创业,形成了一个以陈东升、田源、毛振华、郭凡生、冯仑、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等为代表的企业家群体。其中包括“万通六君子”——冯仑、潘石屹、易小迪、王启富、刘军、王功权。

“92派”共识:重振企业家精神



■ 本报记者 张艳蕊

20年,弹指一挥间。这句话用在“92派”企业家身上似乎很不合适,因为他们曾经经历了数次弹指,几次挥,已经说不清楚了。

尽管也有人否认92派企业家这一说法,但是,92派企业家这个圈子已经形成,这是不可否认的。2012年2月4日,92派集体亮相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他们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热点。

“92派”企业家,成长于一个特殊的年代,在他们身上,带着时代打下的深深烙印。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先驱,就像小马过河一样,多数企业还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一脚深一脚浅,有的过去了,有的摔倒了,有的摔倒又爬起来继续上路。

这些企业家当年有些来自机关,有些出自学校,他们大部分上过大学但不甘于重复与单调,他们多为60后,既懂得实业报国,也接受资本运作,他们学会了四两拨千斤,成为中国经济的脊梁。

沿着这个圈子里企业家的发展走向,我们试图通过梳理他们的发展轨迹,来解读改革开放、尤其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以来中国企业家的成长脉络。

公知派:放不下责任感

代表人物:冯仑、潘石屹、王功权、毛振华等。

“92派”企业家是由曾经的政府官员、知识分子等社会主流精英下海组成的,责任感、使命感是这个圈子的集体宿命。

92派企业家开始起家是游走于商人之间去获取机会,这些人开始都没有原始积累,但是随着历史的循环,成为纵横天下的一方诸侯。这些企业家是那些通过宏观考验的企业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开始学习如何从老板做到真正的企业家。

当初潘石屹们到海南创业,遭到银根紧缩的灭顶之灾,后来他们回到北京,依靠观念和思路在地产界东山再起,这群人从浑水里爬出来,到现在终于站稳脚跟,这就是最大的生存智慧。他们在“狗群中学狼叫”,甚至可以做到在“痞子堆里边比痞子还痞,在文人堆里也能谈经论道”。

这其中,有“中国期货教父”之称 的田源已经彻底转身,成为“致力于中国企业家国际化”的中国企业家论坛主席,而中诚信集团创始人毛振华的新浪微博认证上也赫然标出“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毛振华”。

冯仑,北京万通集团董事会主席。他在成功地完成从教师到房地产商人的发展之路后,获得了一些“房产教父”、“房产界思想家”等一些眼花缭乱的美。在推出“一本讲述民营企业家的心灵史和观察中国社会生态繁荣过程的书”《野蛮生长》的同时,他的个人电子杂志《风马牛》也在尝试增加更多的栏目来吸引读者。他相信“思想有多远,一个人就能走多远”;他正在努力地把自己变成一个思想传播者。新书《理想丰满》的出版,也将92派企业家骨子里那永远放不下的文人心态显露无遗。

潘石屹,SOHO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也是中国网络时代与大众传媒最早的拥趸之一。通过博客、网聊、微博以及众多重要的会议,向公众宣讲行业趋势和更广泛的社会话题。目前已出版《我用一生去寻找》、《投诉潘石屹、批判现代城》等8本书。《我用一生去寻找》在全部坦承了自己的成功经验之后,潘石屹延续务实的理想主义者的思考逻辑,放眼未来,对渐呈趋势的“未来新世界”作出了不同凡响的描述。他也反思自己的成功以及成功之后的迷茫,意欲寻找一条从物质到精神的解放之路。

在美国,“公共知识分子”是个很了不起的称号,因为它不仅意味着这人是社会学者,资历过关,受过优秀的高等教育,并在某个社会研究领域严谨治学,拥有著作若干;更重要的,是他能够运用自己的丰富知识和强有力的笔头来分析热点问题,以科学的态度冷静而热情地为弱势群体说话,往往对抗大公司或者政府谎言,追求真相与“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

而在当今的中国,真正推动社会进步的知识分子,才有资格称其为公共知识分子。

92派企业家责无旁贷。

实战派:永远的主流精英

代表人物:陈东升、郭凡生、易小迪、朱新礼、黄怒波、俞敏洪、禹晋永等。

92派企业家的另一类是一直坚持做企业,尤其是做实业。任志强认为,92派企业家不是在贪婪分享财富,而是分享当驴拉磨的过程。

陈东升自称“92派”,也是1992年从体制内向商界移动的那一批人中成功的一位。他和张瑞敏、王石、柳传志等处在先驱者地位的精英们一样,成为社会“主流精英”,不但率先引进各种企业管理理论、销售模式、文化理念,还逐渐成为行业内的标杆企业。

朱新礼,北京汇源饮料食品公司董事长。他创办的企业不仅构建了一个庞大的产业化经营体系,带动了整个中国果汁行业的发展,促进了水果种植业、加工业及其它相关产业的现代化发展,帮助百万农民奔小康。如今,朱新礼依然在为自己“大中国,大农业,大品牌,大有作为”的理想实践着。正是因为“92情结”,2009年,当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案被商务部驳回时,他说出这样的话:“我没有任何的怨气,我觉得我必须服从国家,因为国家给你提供了平台,让你创造了这个品牌,国家它不需要让你卖给可口可乐,那你就完全无条件地服从于国家的这种安排。所以一个爱国的人他不会和国家去作对。”

日后,在92派企业家聚会的时候,朱新礼表示,“我们对于国家的这种归属感、这种感情,感情后边就是责任。一个企业家它对于国家的这种归属感应该要有强烈的意识。”

这就是那个特殊年代造就的92派企业家的境界。

92派企业家还有一个特点,大部分属于“红顶商人”。北京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黄怒波就是一个代表。地产业,黄怒波已经成为一个符号,这个符号给他的地位很特别。

2012年1月的“冰岛政府阻止黄怒波提出的800万美元购地交易,是因为对方忌惮他的中共党员身份”消息很快传遍中国乃至世界。正因为是属于

92派,黄怒波一直表示“不会就此罢手”,走出去是企业长期战略。实战派永远不怕环境困难。

公益派:庄严的使命感

代表人物:刘晓光、冯仑、陈东升、袁岳等。

中国有这样一群企业家,他们在一起不谈商业利益、不谈投资热点,而是会为了追求同一个梦想而争执的“面红耳赤”。阿拉善SEE协会这个囊括了国内百余名活跃企业家的组织里治沙、环保成为了他们共同的使命。他们共同的身份也是92派。

2004年6月5日,由王石、刘晓光等百位中国企业家在广袤的腾格里沙漠里排成一道历史性的风景——中国首家以社会责任为己任,以企业家为主体,以保护地球生态为实践目标的NGO(非政府组织)公益机构——阿拉善SEE协会成立了。刘晓光认为,一个好的企业家,不仅应具有强大的经济价值,而且应具有强大的社会价值,体现人类新的理想、新的精神、新的信念。阿拉善应该是中国企业家集体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的一个崭新的开始。

92派企业家、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兼总裁袁岳认为,现在的公益有的是精英主导的公益,他们也容易得到更多的资源,有的是草根主导的公益,他们的处境更困难。政府资源应给予草根公益更大的公益,因为精英们可以自己动员不少社会资源,而草根资源少,但数量多分布广,他们也许参差不齐,但是在群众性的公益中,他们总会产生不少有价值的典范。袁岳正全身心投入到零点青年公益创业发展中心(YES)发起“白领黑苹果”系列活动中。

历来企业家群体中会有一大批人变成慈善家。企业家赚钱的时候很凶猛,他们捐助的时候也非常慷慨,但是慈善家的概念并不是捐助很慷慨,而是能够很专业的,懂得把私有财产通过最好的现代方式用于公益事业。

92派企业家因其原有的精英品质而成为专业公益事业主导者。

历史

20年前,88岁高龄的邓小平通过“南巡讲话”,宣告启动新一轮改革,将中国带入一个新的方向。市场地位被确立,社会创造力被激发,个人价值被尊重,中国经济在那一年后实现了新的起飞。

“92派企业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成长起来的一批企业家,泰康人寿董事长兼CEO陈东升是“92派”这个名词的发明者。

1992年,是中国企业家成长的转折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后,国家体改委颁布了《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党的十四大决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确立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当时,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受南巡讲话的影响,纷纷主动下海创业,他们具有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在企业运作上有现代观念,他们也是上世纪90年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

这一代企业家也被称为中国第二代企业家,之前的企业家是国企初步改革的厂长、经理们,或者是乡镇企业、“红帽子”企业的最高管理者们,他们所受束缚太多,有人认为,他们甚至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企业家;但是后来者从他们身上汲取营养,成为新一代企业家。

正是92派,将商业价值推上了主流价值观,不少主流精英们下海创业,开创了现代企业发展和经济变革的新篇章。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摘要:

——多干实事,少说空话,不要吹嘘自己,尤其是报刊宣传要谨慎。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

——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有些理论家、政治家,喜欢拿大帽子吓唬人,“左”的东西在党的历史上很可怕!

——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社会主义最终要达到共同富裕。

——整个改革开放过程都要反腐败。对共产党员来说,廉政要作为大事来抓,还要靠法制。

92派纪事

“92派”的定义来自陈东升:政府官员、知识分子等社会主流精英下海组成的有责任感、使命感的企业家群体。

1990年,俞敏洪离开北大英语系,创办“新东方”。

1991年,冯仑和合作者分头借钱,筹钱3万块,成立海南农业高技术联合开发投资公司。

1992年,郭凡生被下海,创办“慧聰”。

1992年,田源下海,创办“中国国际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1992年,原深圳蛇口工业区常务副区长武克刚被下海,创办“通恒”。

1992年,副县长热门人选朱新礼下海,创办“汇源”。

1992年,胡葆森离开河南省外经贸委,创办“建业”。

1992年,苗鸿冰离开石油部办公厅,创办“白领”。

1995年,黄怒波去职中国市长协会副秘书长,创办“中坤”。

他们

王石:我有底线,不行贿

我当然有妥协,但是我有底线。社会的本身就是妥协,理想主义和妥协不矛盾。刚才说的不行贿,就是我的底线,如果我不行贿,我经营的企业生存不下去我宁肯关门,我宁肯出国当二等公民。

袁岳:我没有回扣、返回扣这些事

没有回扣、返回扣这些事,不用一天到晚账目倒来倒去的。不管谁进去了,跟我没关系。不拿回扣的时候,客户对公司是挑剔的。拿了回扣,活干得不好也会有人帮你过关。

毛振华:92年下海企业家并不仅仅是想发财

我们也觉得在中国搞市场经济,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的确我们觉得应该自己投身于这种实践中去。当然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当大老板、发财的感觉,就觉得这是国家需要,要搞市场经济我们应该要投到里面去。

郭凡生:让尽量多的人成为股东天经地义

让尽量多的人成为股东。我认为这是天经地义,是一种必须做的行为,并不是什么高尚的行为。现在我给企业家讲股改,他们最纠结的是把钱分给别人舍不得。

田源:我推动了中国改革和各行各业发展

这几件事全是推动中国改革和各行各业发展的大事,它主要得益于我的经历。比如期货行业,我在美国考察、学习国外经验,再引入中国。我当时向国务院领导提出建议,建立中国的期货市场。

武克钢:我不在原来工作的系统做生意

我没有在原来工作的地方或系统里做过生意。我是有意识的。这一块做好了,别人说你过去是区长、局长,靠得这个;做得不好,万一出点烂事,别人把你骂死,原来名声还行,一世英明毁在这。

王功权:我渴望一个公民社会

我不觉得自己是英雄。我没有什么英雄梦。我内心渴望社会,是一个公民的社会,没有英雄、没有伟人,但每一个人都能够活得自由,同时也有自己的尊严,尊重自己的权利,也尊重别人的权利。

黄怒波:我就是想要留住那种原乡文明

安徽宏村是我一手做的世界文化遗产。我就是想要留住那种原乡文明,留住那种古典主义的浪漫。我希望在稀缺的旅游资源基础上,给人提供第二生活空间,创造关于文化和自然的享受。

(江雪编辑整理)

解读

向“92派”企业家致敬

■ 严蕊

2012年的第十二届“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选择了“纪念邓小平南巡二十年”为主题。

毛振华并不讳言:“20年之前,下海的都是体制内的佼佼者,充满精英感,觉得能为这个世界做什么。20年后,大家的精英感差不多都消逝了。再成功的企业家,在一个科长

面前可能也要低眉顺眼的。如今离开体制的,多数是被扔到海里的,体制的磁力不是减弱了而是增强了。”

亚信科技原CEO张醒生慨叹:“企业家朋友普遍对未来有较大不确定性和担忧感。我突然想起在上世纪80年代时有首歌是‘明天会更好’。1992年邓公南巡,社会为之振奋,有了《走进新时代》这首歌。今天,哪首歌可代表我们现在的时代

精神呢?”

当年的“92派”们,大都是体制内的精英,下海,是他们的一种历史选择。

如今,中国的公务员已成第一国考。下海,已是一个陌生词语。

一位署名林杨林的新浪博主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当年,年广九受到保护,如今吴英被判死刑。……改革如果继续停滞,20年后,还会出现今

天这样一群卓越的“92派”吗?

吴英死刑案,“92派”企业家发出呼吁,表现出对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切实纪念,也是对改革精神的呼吁。“92派”企业家们的心声是一致的,希望中国强大,希望中国继续朝前走。

纪念“92派”,是希望20年之后,社会公众依然从他们的历史脚印中读到中国企业家精神。